



# 东汉：皇皇《汉书》出兰台

□ 焦利

在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王莽的新朝。王莽改制的失败，导致了绿林、赤眉等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王莽之乱导致西汉宫廷藏书大多被毁和散佚，这是继秦火之后中国官方藏书遭到的又一次重大灾难。不过到刘秀重整河山，建立东汉之后，朝廷又逐步聚集了大量藏书。李尤在《东观赋》中形容“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东汉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藏书成就呢？这主要归功于法律保障、技术发展和几位皇帝的积极作为。

首先，汉初废除秦代《挟书律》是图书发展的法律基础。因为废除了《挟书律》，平民百姓才能开展正常的图书制作和交流活动，而这又促进了民间藏书的发展。西汉的时候，民间已有了“书肆”，类似于现在的实体书店，只要你有钱，许多书在“书肆”都可以买到。对于那些没钱买书但又想看书的人，也可以在“书肆”看书。随着社会对书籍需求量的增加，还催生了专职的抄书职业：佣书。因为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所以图书的复制只能靠传抄。但即使只是手工传抄，也使得民间的藏书大大增加。当时还有一种“槐市”，也是书籍交易市场。汉武帝设立太学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成帝时，人数已达数千之众。众多大学生聚集一地，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因此逐渐在太学旁边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之所以叫“槐市”，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槐树而得名。集市每半月一次，交易的内容不仅是地方的特产，更主要的还是大家所用的图书。自己用过的书不用了，需用的书一时又没有，大家就到“槐市”去进行交易，以我所有，换我所需，互通有无，对当时的图书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王莽之乱时，许多文人带着自己的藏书躲入深山，到东汉朝廷建立并向天下征书时，这些人又带着自己的藏书重出江湖，为朝廷征书大业贡献了力量。

其次，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大大促进了藏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使得纸张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有力促进了书籍的生产、传播和收藏。古时用来写字的材料主要是简牍和缣帛，简牍太沉，缣帛又太贵。所以除了皇室，一般只有王公贵族、官员人家才有财力藏书。虽然在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工艺比较初级的造纸术

出现，但因为成本太高并没有推广开来。而东汉经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使用的原材料都是些树皮、麻头、破布等不值钱的东西，使得造纸成本显著降低，这种纸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所以很快就普及开来，人们写书、抄书有了更加轻便便宜的载体，书籍的增加十分迅速，民间有财力藏书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为东汉朝廷的征书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汉官方藏书丰富起来的第三个原因则是东汉前三任皇帝的大力搜求。后人所谓东汉历史上的“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说的就是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位皇帝的功绩，他们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和扩大国家藏书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可圈可点。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书籍的收藏，在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收集书籍。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所以他每到一地，都要先拜访文人雅士，采集图书。登基后更是下旨天下，广征图书。那些在战乱时怀挟图籍、遁逃山林的文人感觉到刘秀的诚意，纷纷献出自己的藏书。据说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时，光是用于运载图书典籍的车就达到2000多辆。这些书籍奠定了东汉皇家图书馆藏书的基础。

汉章帝在征书方面有所创新，他“诏求亡佚，购募以金”，在中国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河。以前老百姓把书捐献给朝廷或者让朝廷来抄书都是无偿的，老百姓献不献书要看各人的觉悟。为了提高老百姓献书的积极性，汉章帝下令从民间买书，购募以金”，老百姓觉得这样更公平合理，所以献书的人就更多了。汉明帝不仅建了兰台、东观等作为政府藏书机构、设兰台令史等专人掌管藏书工作，更重要的是汉明帝慧眼识珠，发现并提拔了一个汉代最有名的兰台令史——《汉书》的作者班固。

班固的叔祖父班倢俦曾因得到汉成帝的赏识而被赏赐了一套皇家藏书的副本，这套珍贵无比的副本成为班氏家族的传家宝，班氏家族也因此而成为藏书世家，为日后班彪、班固、班昭得以博览群书、积累学问并纂修《汉书》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班固的爷爷班倢俦曾经官至广平相，在王莽当政时感觉朝中形势复杂，便主动归还相印，远离了波涛汹涌的政治中心，闭门闲居、专心企业为主导、以专利为纽带、以产业化为目标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专利密集型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促进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加快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精准对接企业和市场需求，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推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着力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和风险防控。充分发挥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的作用，促进创新型经济、品牌经济和特色经济发展，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促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形成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坚持“一省一策”共建知识产权强省，促进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创新。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知识产权制度不仅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催化

读书。受班倢俦影响，他的儿孙辈也都博览群书、酷爱学习，班固的父亲班彪更是对修史情有独钟。因为司马迁的《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只写到当时的汉武帝，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司马迁去世后，不少学者曾续补《史记》。但是班彪认为现有的续补作品大多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于是利用家族的藏书资源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写下《史记后传》数十篇。只可惜班彪续补《史记》的宏愿还没完成就去世了。班彪去世后，班固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立志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

但是，谁承想“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说他“私修国史”，篡改汉朝历史。班固因此被捕下狱，书稿也被官府抄走。班固的弟弟班超一听说哥哥被抓了，担心哥哥在狱中会有什么闪失，一急之下就连夜策马飞奔到洛阳，求见汉明帝，替班固申冤。班超将父兄两代修史宣扬“汉德”的意向告诉了汉明帝，正好有下属将班固写的稿子拿过来让汉明帝审查。汉明帝一看，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于是下令立即释放班固，并召班固前往洛阳，拜为兰台令史，专门负责掌管和校勘皇家图书，同时继续编纂《汉书》。

从“私修国史”到“奉诏修史”，班固的修史工作迎来重大转折。汉明帝的旨意，使他修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而且由于有皇家图书档案可资利用，班固修史的准确性大大提高，进度也大大加快了。到班固去世时，《汉书》的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记录了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到王莽被杀，共计230年的历史，十二代帝王。按照史记的体例，共一百篇，约八十万字。《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史书，并且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为后世了解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乃至天文地理都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又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完成“八表”，并续写《天文志》。

班昭作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同样是“博学高才”。由于长期受到父兄史学素养的熏陶，且在父兄修史时也经常做一些辅助工作，所以班固去世后，班昭也有意要完成父兄未竟的事业。正好这时汉和帝下诏，让班昭到皇家图书馆即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这对班

昭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东观藏书阁书籍浩瀚，资料十分丰富，班昭经年累月，对《汉书》进行了整理和修订，对一些晦涩难懂的文字进行了通俗易懂的修改，又写完了班固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终于使得《汉书》完整呈现于世。

《汉书》将《史记》的“八书”改为“十志”，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开后世史记刑法体例之先河；《五行志》记古今气象灾害等自然现象与人事的联系；《地理志》记录了当时各郡国的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还有各地的山川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等内容。

特别是《艺文志》，这是中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是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为纪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根据刘歆《七略》删修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情况，是研究西汉藏书和学术流变的重要文献资料。班固在正史中立《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河，对后世的目录编辑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以后的史书如《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等都仿效班固的《汉书》记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如果把汉代以来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加上其他各种补志整合起来，就可以大体形成一部3000多年来中国图书的总目录。这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未曾断绝的确凿证据，真是了不起的功绩。

正因为有了法律保障、技术发展和前几任皇帝的积极作为，所以到汉章帝以后，数十年间，东汉朝廷各处藏书阁，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旧典新籍、汗牛充栋。正如《隋书·经籍志》记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东汉皇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有力保障了《汉书》的最终完成。东汉君臣，为中华历史和文化遗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上接1版）健全知识产权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体系，做好专利分析预警，优化专利导航服务，构建重点产业专利池，促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助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知识产权，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加快推动产业创新。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科技成果只有实现产业化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企业专利转化率达到了51.3%，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2022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5.3万亿元，“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12.4%，彰显了专利密集型产业较高的成长性。我们要聚力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深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进以

剂，也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加速器。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增长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在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量超过12万件，位居全球首位；近五年我国动力电池全球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8%，增速位列全球第一。我们要畅通绿色技术专利申请审查“绿色通道”，支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绿色知识产权统计监测，加强专利审查与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协同，更好满足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需求。大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知识产权运用，积极建设绿色环保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的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产业在专利密集型产业中的占比，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更加积极主动深化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就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作出重要部署，将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也得到有力加强，通过改革纵向缩短了知识产权管理链条，横向加强了协调联动，整体提升了管理效能。我们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以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为牵引，带动知识产权工作全链条提质增效，助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流动。推动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创新创造积极性、主动性。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标准，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力度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汇集，更大规模利用外资，助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作者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政论代表作。“校”即校正。“邠”为商、周时代邑名，因周太王居住在邠，对入侵之狄行宽仁之道而出名，故“邠”成为对外实行宽仁之道的代称。“校邠庐”三字连用是冯桂芬首创，也是他的住所名。以《校邠庐抗议》为书名表达了冯桂芬对清政府一味妥协外交政策的批评态度。书中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

冯桂芬（1809—1874年），晚清政论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19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32岁中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曾师从林则徐，入李鸿章幕府。他一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提出了许多救国救民的改革方案，在思想启蒙、兴学重教、减赋为民等方面颇有建树。

## 国家大义、惟善是从的政治主张

清代晚期，鸦片战争后外敌环伺，民族危机愈发严重，“救亡与启蒙”成了时代主题。身为文人士子，冯桂芬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用纸笔书写救亡图存之路。在林则徐及友人魏源、姚莹的影响下，冯桂芬开始对西方情况有所关注和了解。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羁寓上海四年租界的生活，使他对西方制度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时的冯桂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环伺下中国的危机。他在《筹国用议》中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冯桂芬完成了《校邠庐抗议》。《校邠庐抗议》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稿四十二篇，全书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阐述了冯桂芬的变革思想，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推动了晚清中国走向现代化。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曾下令印刷1000部，将其作为百日维新时期鼎新革故的纲领性文件。《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提到，此书“于经国大计，指陈剴切”。冯桂芬的改革方案可以归纳为“复古法”和“采西学”两类。他的“复古法”并非一味照搬三代之法，而是选择性地对古法进行筛选改造，使其适应当代社会问题。他又在林则徐、魏源等人的“采西学”论述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鉴诸国”的观点，倡导平等接受西学中的各个强项。为了更好地推行向西方学习的观点，他主张“惟善是从”，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无论古今、不管中西，只要能够富国强兵的方法都可以使用。这反映了他勇于反省本国文化、吸收别国文化的积极心态。

## 兴学重教、开启民智的教育主张

要“采西学”“鉴诸国”，就必须要了解、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则是第一步。冯桂芬深受儒家重教思想浸润，倡导学习西方文字，培养博通西学人才，开启民智。《校邠庐抗议》中提到，“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他不仅主张兴学重教，更是躬身力行。同治元年（1862年），他以幕僚身份向李鸿章提交《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建议招收14岁以下儿童入学，研读外国语言及自然科学，以“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上海同文馆最初拟名“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其后正式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由冯桂芬负责总体规划建设，拟定《章程》十二条，规定了办学宗旨、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等内容。在晚清中国三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中，无论是从外语程度还是从造就外交人才来看，均以上海同文馆成效最大。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冯桂芬奠定的良好开端有很大关系。对此，李鸿章上奏称：冯桂芬“谋设上海广方言馆，务求博通西学，卓识宏议，足裨军国而重久远”。

## 四方奔走、减赋为民的主张

《校邠庐抗议》主张改革漕运、减赋均赋，开垦西北、兴修水利。这一



主张的提出和他的家庭教育、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江南自古赋税繁重，苏州、松江、太仓三地赋税最重。民国《吴县志》记载，“亩税几二斗，较他省多至一二十倍，较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毗连之常州府多三倍。自道光以来，历年缓征分数属全漕一百六十万（石）”。对于因赋税过重而给苏州百姓带来的苦难，他深有感受，因此，为家乡人民奔走呼吁减赋成了他的“平生大愿”。咸丰三年（1853年），守制在籍的冯桂芬多次致书时任江苏巡抚许乃钊，提出“均赋”主张，倡导绅民一律，防止行贿通融，杜绝绅衿积欠。咸丰十年（1860年），冯桂芬以减赋事上书曾国藩，得到首肯，代曾国藩、李鸿章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陈述了苏松太重赋的前因后果，强调了减赋的重要性、必要性。最终，苏、松、太三地减赋税近三分之一，常、镇减赋近十分之一。减赋的促成，使兵燹之后的江南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李鸿章评价：“此数端于朝廷为大政事，于江苏为大利害”。江南人没有忘记冯桂芬在减赋方面的功德。光绪十年（1884年），苏州人陶煦在《租税》一书中写道：“吴冯氏桂芬所撰《显志堂集》，其均赋诸篇，暨潘鼐庭寿序，有慨乎其言之，盖欲取当时大小户不均之赋而使均。诚厚民之盛心也，乃世顾不道其均赋之善而独以减赋事啧啧不去口何哉？冯氏之拟疏减赋也，反复较计，情词恳惻，得以乞朝廷汪濊之恩，三分减一，皆疏之功也。”

冯桂芬先后教于惜阴、敬业、紫阳、正谊等多家书院，形成了校邠学派，致力于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培养出来的弟子吴大澂、王颂蔚、叶昌炽等在文学、训诂学方面卓有成效。同治八年（1869年），受苏州知府李铭皖延聘，冯桂芬在家开设修志局，纂修《苏州府志》，担任总纂。同治十三年（1874年），冯桂芬因病逝世，享年66岁。李鸿章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这样总结了他的一生：“均赋治河，运筹决胜，条变画奇。舒古琳今，龄谋晦断，一身兼之。不荣于禄，而富于书，浩博无涯。我铭藏幽，君书在世，其传奚疑？”而冯桂芬“惟善是从”“开启民智”“减赋为民”的诸多理念，也完整呈现在他的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以殁后世。

